

作为表达方式的《周礼》：清末变局与中国传统典籍

孙 青

The Ritual of Chou: as an EXPRESSION under the Knowledge Crisis of Later Imperial China

SUN Qing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19th century China, changes in fields of knowledge had been mo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practical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During these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s, many progressives in or outside the government had disputed on how to reinterpret and make use of the traditional classics. This paper tries to investigate such disputations on a classic of the Old Text School: *The Ritual of Chou*. This classic had finally been transferred into a special express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reformation from 1902-1905.

Keywords: *The Ritual of Chou*; Reinterpreta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lassic; transformation of Later Imperial China; Western knowledge to China; Chinese Modernization.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朝野关心时局的官员与士人们开始省察到自身已处于一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间。¹⁾这种忧患意识是着眼于有关世界与中国之形势的观感，也是由西学东渐以来渐趋增强的文化紧张感所致。近年来，关于清末朝野应对上述“变局”的研究已经日益丰富。除了从这一新的问题意识出发来讨论政治、经济、外交诸层面的实际操作以外，学者们亦深入论述了中国本土思想与知识世界因此而发生的裂变。他们曾先后清晰地梳理过中国士人最初根据自身的传统知识资源，采取重新诠释古典以回应新变的历史过程。²⁾直到20世纪初清廷迫于各种压力开始推行大规模的“新政”变革，中国传统经典仍是论证实际政治行为合法性的主要资源。

1901年，瑞安礼学大师孙诒让受盛宣怀之托，以周礼为纲，参合西政，草拟了《变法条议》四十篇，

1) 参孙邦华：《西潮冲击下晚清士大夫的变局观》，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二十一世纪》，2001年6月号。

2) 参全汉升：《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岭南学报》，1935年第2期；葛兆光：《应对变局的经学——晚清对中国古典的重新诠释（一）》，见《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22页。

以应朝廷言新政之诏，嗣后却因故而未被盛宣怀上呈。孙诒让于次年将手中保留的底稿更名为《周礼政要》，并补作自序列于湖北布政使、宛平人翟廷韶的序言之后，由自己在本乡主办的普通学堂刊行面世。翟廷韶在序言里面提到，当时中国“政法未更而中西新故之辩舛驰异趣，已不胜其哗聒”，一语道出了庚子辛丑之际，欲行“新政”的朝野业已陷入了针对所谓“中西新故之辩”的舆论纷争。

事实上，从张之洞1898年4月抛出《劝学篇》，欲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姿态自别于康梁与《时务报》维新党，到清廷1901年因“庚子巨创”而于西安行在下诏重臣“参酌中西政要”条议新政，朝廷内部主动或被动的变革多少都遭遇了既要与维新党有所区别，又必须为自身行为“正名”的理论问题。其关键之处仍是如何统一并消解日益对立的“中西新故”之壁垒，并占据舆论上的绝对主动权。从戊戌到庚子，时移势易，内政外交的不堪现状赋予了“新”及“西学西政”日益增强的现实合理性。一方面，“守旧”成了日益不能负荷的标签，另一方面又必须为之前以雷霆手段镇压维新变政作出前后一致的解释，同时保住皇权赖以存续的传统统治学说的解释力。相较而言，当戊戌时期康、梁与张之洞在会通问题上殊途同归之时，³⁾ 中西新旧间的舆论力量对比尚未如庚子以后这般明显。而到了三年后的庚子辛丑变政之际，为政者所要面对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泯除中西新旧对立的壁垒以谈化自身守旧的形象，而且更必须在统合中西的方法与理论上占得先机与主动权，方有可能主导舆论。只是，从戊戌到庚子毕竟只有短短两年，思想领域可资利用的合法性论述资源却仍主要是传统经典。并且倡导新政者还不能如在野或出亡的维新派那样逐渐挣脱原先的束缚，自由运用自成体系的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因此便不得不在如何重新诠释与应用传统经典资源上煞费苦心。而古文经典籍《周礼》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到了新政理论建设的前台，与康有为之前提出的今文经典籍《春秋公羊传》相对。前文所及孙诒让之应盛宣怀所邀作《周礼政要》，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命题作品。

学界以往的相关研究，多侧重于思想学术领域内部的论争或新旧知识体系间的互动，从清末新政前后，现实政治层面之舆论建设的角度来讨论朝野有关应用与诠释《周礼》的具体情况及其纷争的尚不多见。⁴⁾ 这篇文章尝试清理的，就是清末从戊戌变法到庚子新政，人们是如何在新的现实政治关怀下重新借用与拆解《周礼》这部古文经典籍的一些具体情况。

一、维新派对《周礼》的使用

由于戊戌前后主倡变法的康有为宗今文经学派，亦是将今文经派专以发挥义理，讲求切合时政的“公

3) 张之洞倡导“中体西用”(张之洞《劝学篇》)，康有为提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康有为：《奏请经济岁科归并正科折》，参康有为著，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294-295)，而梁启超也引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主张“舍西学而言中学，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这便是梁启超后来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总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之具体情形。

4) 关于《周礼》在经学史上作为经典被诠释的情况，可以参考周予同、侯家驹、叶纯芳的相关研究。以往讨论清末西学中源说的研究，孙诒让研究，《周礼》研究，经学史研究中都有提到《周礼》被重新解释使用的一些具体情况，但是将对《周礼》的肢解诠释与应用放在清末变局不同阶段的历史背景下来讨论的并不多见。参周予同著，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侯家驹，《周礼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叶纯芳：《孙诒让《周礼》学研究》，台湾东吴大学文学系博士论文（未刊），2005年第2学期。

羊学思想”积极推向政治舞台的始作俑者。因此，围绕在康有为身边的维新派在比附西学、西政，推行变法时，主要使用的经典是《春秋公羊传》，其拆解经典文本的说理方式也是晚清“公羊学”最擅长的，发挥“微言大义”的方式。

相较而言，古文经学家刘师培、孙诒让以至后来的章太炎，他们系统地以古文经派《周礼》之学来言西政，则是要到20世纪初头戊戌维新失败，政府倡言新政，来自日本的“东学”渐次登陆这样一些新的历史背景下才得以正式展开的。此消彼长，并非全然无迹可循。

不过，在以今文经派之公羊学系统比附西学、西政的同时，戊戌维新派也引用古文经籍《周礼》来讨论所谓“西方的制度”。如与康有为同组强学会的江西瑞金人陈炽，⁵⁾在他游历沿海大埠至香港、澳门等处，考究中西政、学之异同后，于1892年写成《庸书》内外一百篇。他在《庸书》中就引用《周礼》，将它作为中国古代圣王制度的记录来与西方的刑律作比较；1896年梁启超写成《古议院考》，于当年11月5日的《时务报》上刊载。他主要是从《周礼》中寻找与西方议院制度立意相通之处；1898年康有为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拟《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将《周礼》所记载的“询国危疑”解释为“国会”之前型，有分上下议院“之意”。从戊戌之前维新派的政治论说来看，他们同样把《周礼》的记载当作“古先哲王”实行过的“良法美意”来使用的。由于要回答“子言西政，必推本于古，以求其从同之迹”这类关于“合法性”的设问，便从中拆出“询国危疑”这样的记载来比附西方的议会分权制度。由于1892年陈炽作庸书时，“古意”是论证制度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因此他的论述角度是证明西方的法律制度比现行制度要更合“古意”——即《周礼》所载。因而从《周礼》的记载中间寻出与“监禁做工”、“轻犯充役”的原则相一致的章句，并阐述它们更为合理的地方。而康、梁则把“询国危疑”的记载与西方国会代议制度联系起来，强调它背后的“意”是“均天下”。

这个时期的维新派士人在舆论建设上使用《周礼》时，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1、虽然按今文经派寻求“古先哲王”之“美意”的方式来阐释古代的“良法”，却并不严守今文经的学术立场否定《周礼》，仍把它当作对上古政治制度的忠实记载来使用，默认它的合法性论证资源地位。

2、在引《周礼》的时候，拆解其中一些零星的章句，与其他典籍如《洪范》、《孟子》的有关记载并列，以比附西方的一些政治法律制度。却并没有从《周礼》一经的整体出发，有系统地分析其所载诸制度背后的“古意”或讨论彼此间的相互关系。

他们在舆论层面使用《周礼》的具体方式既与今文经派的学术家法并不完全一致，又与古文经派后来使用《周礼》以论政的做法有很大区别。究其原因，是否出于宣传策略的考虑，想在论政时淡化今古文的门户之见，以调和中西新旧，最大程度地吸引各个层次读者的同情，颇难揣测。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

5) 陈炽，晚清官员，思想家。原名家瑶，字次亮，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光绪举人。历任户部郎中、刑部及军机处章京，深研经济之学，广游各地，并赴香港、澳门考察，钻研西学，主张学习西方以求自强。1893年撰《庸书》内外百篇。1895年与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任提调，鼓吹变法。称赞议院制是强兵富国之源，主张在中国行君主立宪。反对外国侵略者在华摄取特权，宣传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带动各部门经济的理论。戊戌变法失败后，抑郁而终。著有《续富国策》等。

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在为变法进行舆论建设时，并不愿意彻底放弃《周礼》这一在接引“西法”、“西政”方面极有价值的传统资源。

二、张之洞对《周礼》的借用

光绪戊戌年三月，张之洞在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的一个月前写成《劝学篇》刊布，并在三个月后由门生黄绍箕进呈给朝廷，一个多月后的八月初六，慈禧太后重新“训政”，维新变法彻底失败。⁶⁾有关张之洞在这样微妙的时机刊布、抛出《劝学篇》的政治用意与思想轨迹，学术界已有不少细致的研究详细地讨论过，此不赘述。⁷⁾

根据以往的研究，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张之洞之欲以《劝学篇》自别于康梁党及《时务报》群体等变法的激进派。其基本原则是“会通中西，权衡新旧”⁸⁾

综观近代经学史，主张调和今、古文之争的努力其实早就出现过。曾国藩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竭力提倡汉宋调和，“既想化解桐城派与汉学家的宿怨，也想消除经今古文学的争端，那办法就是把经学说成“礼学”，以为考据、义理、词章、经世，对于治礼都有必要，不存在本末轻重的区别。”而凌廷堪也早就明确主张“经学即礼学”，焦循、阮元、凌曙等，都有类似主张。⁹⁾不过，正如朱维铮教授所指出的，无论从经典依据还是“恢复祖制”的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曾国藩以礼学来调和经学界纷争的努力都缺乏实践基础。¹⁰⁾

时移势易，张之洞所要调和的已经远非曾国藩时代的经学界内部纷争，而是既要“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又要自别于康梁维新党人。但是，他似乎无法不同样援引《周礼》这一传统资源来处理问题，那么又将如何才能理论叙述上实现区别呢？

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提出读经的方法是“守大义”，强调追求经典背后的大义是“存中学”的关键。这种解读经典的工具性的取向与追求微言大义的维新派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最基本的不同其实是在于，究竟由谁掌握对“大义”的阐述与解释权，谁又能更多更广泛地从传统中找到理论支持。

学术上主要宗今文经学的维新派在舆论策略上也注意到要泯中西、新旧之壁垒，并且并不放弃《周礼》这一传统资源，但是却没有试图从整体上去重新解释《周礼》背后的大义，利用《周礼》只是停留在“寻章摘句”的层面。张之洞的做法却并不尽同。当他以传统资源来接引西学、西政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顾忌，对他而言，“破除门户之见”后，《易》、《诗》、《书》、《周礼》皆可为我所用，来分析背后一以贯

6) 参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

7) 参冯天瑜：《洋务派与改良派思想交锋的记录：读《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随笔》，《江汉论坛》，1987年第1期；张力群：《张之洞与〈时务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2期。

8) “戊戌春，金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参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二十八。

9) 参朱维铮：《中国经学的近代历程》，载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2页。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

10) 参朱维铮：《中国经学的近代历程》，载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

之的“大义”。他说：

《周礼》大义，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太宰建邦之《六典》、《治典》，经邦国、治官府、纪万民，其余《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皆国、官、民三义并举。盖官为国与民之枢纽，官不治则国民交受其害。”此为《周礼》一经专有之义，故汉名《周官经》，唐名《周官礼》此总括全经之大义也。

也就是说，读《周礼》要抓住它的本质。张之洞解释说，此书是讲治国、治官、治民这三件大事的，而其中“治官”是连接国与民的枢纽。张之洞试图从整体上探讨《周礼》所载制度背后的治理国家的思想，以此作为论证变革合法性的资源，并采本朝古文经派周礼学大师孙诒让正在撰著的《周官正义》为参考的唯一标准注本，这种做法是康梁等维新派所没有的。

不过，与此同时，张之洞也没有避免将《周礼》所记载的制度拆解开来与西方现行制度作比附，例如把《周礼》记载的“土化之法，化治丝枲，饬化八材”解释为“化学之义”，把“山虞、林衡之官”说成与“西国专设树林部”的设想一致等等。张之洞作为一名朝廷“大员”，虽然在“学务”上任职多年，却始终并非注经的专家。他以解经者的姿态来使用《周礼》这一资源，却又没有相应的学术声望来调和经学上的纷争，因此虽能与康梁等维新党人区别开来，却也难免遭人诟病。宋恕在读了孙诒让的《周礼政要》后，写信给孙，说：“尊著开宗明义，已得骊珠，本末秩然，密切情理。视某大吏等杂聚败叶之论，不可同年语矣。”¹¹⁾明显对张之洞运用《周礼》这一资源的具体方法，表示了不满与嘲笑。

维新派、朝廷大员、古文经学家，究竟谁才有资格在晚清纷繁复杂的变局中真正获得对《周礼》这一传统资源的解释与使用权，以之来附会、证明西方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从而取得倡言新政的舆论主动权。这种纷争似乎从戊戌维新方兴未艾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并一直延续到了庚子辛丑之际的新政时期。

三、庚子辛丑之际的《周礼政要》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因八国联军入侵而避乱于“西安行在”的慈禧太后颁布上谕“诏议变法”，正式召集群臣以两个月为限，“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详悉条议举办新政的具体方案。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

……

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咎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除奸于一旦。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军

11) 费念慈致胡调元函手稿二件，藏温州博物馆。转引自胡珠生：《〈周礼政要〉探略》，载《孙诒让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瑞安，2000年11月。

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模，斟酌尽善，切实施行。自西幸太原，下诏求言，封章屡见。而今之言者，率出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成见，更相笑亦更相非，两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一归于窒碍难行。新近讲富强，往往自迷本始；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尔中外臣工，当鉴斯二者，酌中发论，通变达权，务极精详，以备甄择。……¹²⁾

从这道上谕来看，主政的慈禧太后是真下决心要推行“新政”，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了，她甚至为此煞费苦心进行了舆论上的辩解。这道上谕试图解释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即区别目前将要推行的“新政”与之前的康梁变法。慈禧太后的办法是“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说自己之前的行为只是剪除乱党，而并非“不许更新”。所谓“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便是要将“革新”与“保守”的标签分别从光绪与自己的身上撕掉。可见在当时“守旧”恐怕已经是不大好听的名声了，如果不能有效规避，便难免碍手碍脚。而过于“趋新”与激进的话，一则恐怕动摇自己的根本，二则在舆论上也难免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

因此，太后诏议新政，与大家商量具体的办法，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她的原则便是要在“新”、“旧”之间拿捏好分寸：既不能“袭报馆之文章”趋新得“自迷本始”“睹其利未睹其害”，又不得“拘书生之成见”迂腐守旧得“不达事情”。朝廷理想中的方案是既能深谙“西政之本源”，又能在“参酌中西政要”的基础上便于推行的条陈。

两个月的时间不算太充裕，欲在朝廷推行新政的政治舞台上一展拳脚的大臣们根据“圣意”开始考虑行动了。

时任会办商务大臣的盛宣怀想到了古文经大师，《周礼正义》的作者孙诒让。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选择《周礼》这个古文经典籍来作为条议“新政”的叙述架构，既能与之前依托今文经《春秋公羊传》而言变法的康梁维新派区别开来，又不至于丧失典雅，找不到传统合法性资源的支撑。而选择孙诒让这位后来被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的周礼学大师来拟稿，更是可以在“发言权”方面堵住悠悠众口，不至如张之洞那样为方家所非议。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1901年4月21日），朝廷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统汇之区”，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昆冈、荣禄、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同时，由于上谕所限定的两个月内覆奏期限早已过期，而各省督抚大臣尚未上奏，故此谕特意催促“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¹³⁾

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虽非督抚，却在第二道催促覆奏的上谕下达后，确定了朝廷的诚意，与翰林院编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601-4602页。

13)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1996.10、第27册，第49~50页。关于张之洞及各地督抚响应谕旨的情况，及清廷的相应动作，李细珠作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参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修江苏武进人费念慈谋划条奏。费念慈在催促上谕下达的四天后，即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七日（1901年4月25日）修书金坛知县瑞安人胡调元，由其代为拜托同乡周礼学大师孙诒让“拟撰”条陈，并转达盛宣怀愿出资刻印孙著《周礼正义》作为酬谢的承诺。同时，盛宣怀与费念慈也对孙诒让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

今作拟撰，却与著书不同，欲挈领提纲，明白晓畅，坐而言者立可起而行，则为卷不必甚繁，方克日可就。其声光力化之说别为《西学溯源》一书，关近时外中国而内夷狄者之口，以《墨子》统之。¹⁴⁾

四月十五日（阳历5月1日）费念慈又驰书胡调元催促孙诒让完稿，重申“以古学挽狂澜”的期待及盛宣怀之意在“简括明白，人人可晓，奏御后方可望见诸施行”，并打算于“（圣驾）回銮后即欲写定进呈，故势不能缓”

孙诒让自此“杜门旬日”以《周礼》为纲，完成《变法条议》四十篇。并于端阳后五日（1901年6月6日）写成《自题〈变法条议〉》八绝句，以作纪念。

盛、费收到孙稿后，发现未能完全符合设定范围，难以上奏，又不便促孙改写，便函请文廷式补写。于是文撰了五篇。再由费念慈对二稿作一次统一整理，以《周官政要》为题，记作“费西蠡撰而与孙仲容、文道希同订者。”

不过，事与愿违。未等盛宣怀越级覆奏，湖广总督张之洞已经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上奏《江楚会奏三疏》，最终成了清末十年新政的第一个蓝图。盛宣怀与费念慈策划整理的《周官政要》虽然费尽心思欲以“古学挽狂澜”，借《周礼》完成新政理论体系的建设，却在“回銮”之前已失先机，因此最终没能上达天听。次年，孙诒让见所著上奏无望，便在瑞安普通学堂自行刊印，以《周礼政要》为名。此书作为新政纲要虽然因为失机而未得上奏，却在一年后科举改试策论的时代变革下因能“提要钩元”而受到狂热追捧，此是后话，暂不赘述。¹⁵⁾

如前所述，盛宣怀找孙诒让来代拟新政条陈，其目标是“挈领提纲，明白晓畅，坐而言者立可起而行”，而孙诒让的具体做法是选择《周官》里面与“西政”相合的内容按条编辑出来。他自己说，写作目的不是要用古经来文过饰非，而是为了证明“中西新故”之“无异轨”，以便使守旧的人没有口实。¹⁶⁾

也就是说，盛宣怀与费念慈为了应召而策划并由孙诒让草拟完成的《周礼政要》，已经明确地在体例上把《周礼》作为一个“政策资源库”来对待，系统地挑选出对更新政治制度有用的内容，重新编辑纲目，从而也打散了《周礼》自身的叙述结构。这种全新的叙事结构不但是之前康梁维新党人所没有着手的，甚至竭力调和中西新旧的张之洞也未能做到。

虽然盛宣怀和费念慈催得很紧，孙诒让仍在6月6日完成《周礼政要》后，将草稿交给妹丈宋恕指正。宋恕在1901年6月20日左右复信，认为《周礼政要》“开宗明义，已得骊珠，本末秩然，密切情理”，特别

14) 费念慈致胡调元函手稿二件，藏温州博物馆。转引自胡珠生：《〈周礼政要〉探略》。

15) 关于《周礼政要》成书的前因后果，种种繁复细节，胡珠生都作了详尽的考订。参见胡珠生：《〈周礼政要〉探略》，载《孙诒让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瑞安，2000，11。

16) “辛丑夏，天子眷念时艰，重议更法。友人以余尝治《周官》，属摭摭其与西政合者，甄辑之以备裁择。此非欲标揭古经以自张其虚侨而饰其腐败也。夫亦明中西新故之无异轨，俾迂固之士废然自返，无所腾其喙焉尔。”《周礼政要·籀庠居士序》

指出他对于《周礼》的应用“视某大吏等杂聚败叶之论，不可同年语矣”。¹⁷⁾ 胡珠生认为这个“某大吏”应该是指张之洞，是有道理的。所谓“杂聚败叶之论”应该就是指同样以《周礼》来言新政的《劝学篇》。而宋恕这里夸奖孙稿与嘲讽“某大吏”的着眼点，应该就是赞扬《周礼政要》创造了一种以《周官》为纲，以西政为目的新的表达方式。而从宋恕的口气来看，庚子辛丑之际，人们对于如何运用传统资源争取在新政时期的发言权还是有所自觉的。从这个角度来品味湖北布政使翟廷韶所言“盖倂变而中阻，政法未更而中西新故之辩舛驰异趣，已不胜其哗聒”（《周礼政要·序》）之语，便不难体会到当时政治舆论论坛的实际情形。

《周礼政要》一共分成两卷，每卷二十篇，共四十篇。每篇的篇目下还设有一些具体的子目。

其上卷篇目分为：朝仪（坐论）、冗官（兼职、减员、裁缺）、重禄、达情（臣民言事）、宫政（内务府隶户部）、奄寺（革内监）、吏胥（革书吏差役）、乡吏、（乡董）、教胄（官学堂、王公游历）、广学（学堂）、通艺（算学 光重化电）、选举（荐举 征辟）、博议（议院）、广报（报馆）、通译（译书 言语文字）、观新（凭单 博物院 博览会）、治兵（民兵）、巡察（警察）、图表、会计（预算决算）。

下篇为：户版、口税、厘布（市肆房屋税）、券税（印花税）、金布（金银圆）、券币（钞票）、渔征、度量、矿政、冶金（炼金银 炼钢）、水利（治河）、教农、树艺（园圃 木材）、保商、同货（公司 商会）、考工、考医、狱讼（讼费 陪询）、谕刑（西律）、收教（警惰 教游 教疾）。

《周礼政要》的论证体例总体上分作三步，第一步引《周礼》经文中相关的典制，附以郑玄的注语，说明其立论的根据；第二步以“谨案”起头，将《周礼》至清的历代相关官制作一叙述，详细比较中、西制度的异同；第三步表达个人对于当时政治的看法及变革的具体主张，条议改革构想。胡玉缙（胡为后来京师大学堂经科周礼学的教习）认为，这种行文方式“颇于经筵讲义为近。其体例则列经文及郑注于前，意取立竿见影，其后发揭西政之作用，绝不一一牵台，无胶柱鼓瑟之弊”，不过“惟书名《周礼政要》，而于《周礼》本义不甚相关，当厕之夏休《周礼并田谱》之列云”。当时士林亦有不同的声音，胡玉缙提到：“是书刊行后，高视诒让者，谓不应作此书”。可是胡却认为，当“著书各视其所宜，学问淹博之人，奚妨为浅近之书。……此书为初变法而设，其所持论，令人有异世同符之感。彼高视二人者，殆未知二人者也”。¹⁸⁾ 看来，作为国家最高学府周礼学的教习，胡玉缙虽然很清楚《政要》打散了《周礼》自身的叙事框架，是应用而并不是注释《周礼》的作品，但还是认同孙诒让以《周礼》为资源来讨论改革这种具体形式之合法性的。

关于《周礼政要》全书比附西制的具体情况，叶纯芳已经做过非常细致的梳理，此处不再赘述。¹⁹⁾ 如果我们对比最终付诸实行的《江楚会奏三疏》来看，张之洞与刘坤一在新政的具体措施上详细着力，而对

17) “尊著开宗明义，已得骊珠，本末秩然，密切情理。视某大吏等杂聚败叶之论，不可同年语矣。但急就之书，意词或复，所据时籍，颇有讹讹，然此皮毛小疵，固无伤大体也。束装往杭在即，未及逐篇细校，遵谕妄举数条，别纸二页上察·驾未回瑞，恕不面别。敬请 著安不宣”（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日左右，原稿缺人名与时日，为胡珠生所考），参宋恕：《致孙仲容书》，见宋恕著，胡珠生编：《宋恕集》。

18) 胡玉缙：《周礼政要》跋，参胡玉缙撰王欣夫辑：《许慎学林》，北京：中华书局1958、313-314页。

19) 叶纯芳将全书比附西制的十篇比较典型的例子制成表格，按照中、西、古、今、异、同来分栏，以方便观察《周礼政要》附会西学的实际状况。参叶纯芳：《孙诒让《周礼》学研究》，台湾东吴大学文学系博士论文（未刊），2005年第二学期，第322-330页。

经典理论的比附并不怎样费心。如《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引用周礼仅一处“考《周官·司徒之职》、《小戴礼·学记》之文大率皆以德行道艺兼教并学，学成而后用之。”《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亦仅一处“然而明慎用刑、不留狱，大《易》之文；圜土教职事，《周礼》之典；疑狱与众共，《王制》之法。”使用起来，仍同《劝学篇》类似，属于寻章摘句，并与《小戴记》、《王制》共列，更似一种政论的修辞手法。或者，盛宣怀们煞费苦心地为新政作理论设计毕竟不如操作性强的《江楚会奏三疏》来得更实用，更符合当时朝廷对于施政纲领的需求。不过，孙诒让代拟的《周礼政要》虽然未能成为新政的施政纲领，却因为它独特的叙述体系而在不久以后科举改试策论的历史背景下大肆流行起来，却也是始料未及的。

四、日新书局之《评点周礼政要》

孙诒让辗转受盛宣怀所托，代拟议政条陈，严格按费念慈要求的“以《周官》为之纲，以历代政治之因革损益诸大端为之目，包举西政，寻其源之出于中法、不谬戾于经义、可实见施行者，条举而件系之”的程式来写作，却最终未获上奏。次年，即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孙为这本书添加了序言和书名《周礼政要》，由自己在瑞安所办的普通学堂²⁰⁾刻印刊发，署名“籀廌居士”。根据孙延昭的《孙衣言父子年谱》所载，孙诒让刻印此书，是给普通学堂的学生做教材参考之用的，根据孙本人《自题〈变法条议〉八绝句》的序言说“偶存此副，移示家塾子弟”来看，这种说法应是准确的。

如前文所述，《周礼政要》作为新政条陈远不及“大吏”张之洞主稿的《江楚会奏三疏》之成熟与可操作性强，不脱书生议政的色彩，很难为当局者所青睐。可是它在教育改革的领域却受到了欢迎。此书除了被孙诒让自己的普通学堂用作教材以外，并被山东巡抚杨士骧大量采购，作为本省各学校的教科书，以致“于是青、兖间复知有《周官》之学焉”。²¹⁾

《周礼政要》受到狂热追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便是科举改革。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

20) “冬，诒让筹办瑞安普通学堂，设筹备事务所于玉海楼下，系将县城原有学计、方言两馆合并为一，而加以扩充，预定于壬寅春首开始成立，分设中文、西文、算学三专修班。自手订章程及各班课程：中文班课以经、史、子、掌故、西政、西艺、舆地七门。教习口授，不编讲义。口授之后，指定参考书目，令学生取书自读，各为札记，备有考问簿。教习日常授课之余，留二十分钟就前所已授备课中出题发问，当场令答，以作测验。诸生各将答案写入簿中，在迟班时呈缴教习，评记分数。每逢星期六，试作策论一篇、仍如家塾书院改卷旧制，评定名次，揭榜出示；西文班课以英语读本、会话、文法及英文世界史、世界地理、世界文选等门。学生中之初习者，用《华英初阶》《英文法程》为基本教材，程度较高者，酌授以英文史地、英文文选等，由教员选录，用眷写版印发诸生；算学班课以中西新旧数学及物理、化学等门。初习者，用《笔算数学》一书为入门，程度较高者，用《代数备旨》《数理精蕴》及《勾股三角》《测量制图》等书，除三班分课各门外，另有国文、伦理、体操三门，则全堂学生共同上课，预定学额，每班三十名，以年在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文理清通，身心健康者为合格。修金，兼学者每年二十元，专治者每年十二元”，参孙延昭：《孙衣言父子年谱》，第299页。

21) “初侍郎盛公宣怀请居士代述《周礼政要》，将上御览。盛惊其陈义太高，不敢即上。乡人遂斫之，书肆争传刊，齐抚侍郎杨公士骧见而深好之，别特命诸学校，用为教科书。于是青、兖间复知有《周官》之学焉”。胡珠生注曰：“原稿初作‘特命购五百余分赐高才生，令习之焉。诸学校用为教科书。’后改”参宋恕：《籀廌居士行年六十生日寿诗序》（1907年8月9日），见宋恕著，胡珠生编，《宋恕集》，第420页。

清廷下旨改变科举的内容：

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评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全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试，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²²⁾

历史的潮流风云诡谲，戊戌时期一度搁浅的科举改制之议终因庚子剧创而重为当政者所施行。从1901年废八股改重策论到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终清一朝实际上各按上述新政策开过两届会试、两届乡试。两次会试为：光绪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1902）、光绪甲辰恩科会试（1904）。两次乡试为：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1902）、光绪癸卯恩科乡试（1903）。也就是说改革后的三年中每年都有乡、会试，其中1902年有一届乡试与一届会试，1903年有一届恩科乡试，1904年有一届恩科会试。1902年的乡、会试因为属于恩正并科两届同考，因此考生人数远远大于以往。1905年以后还有一些安置年老生员的考试，但目的已非为国选材了。

从科举改革后的几届乡会试考题来看，有一些便是直接要求从《周礼》出发来阐述西方政艺等制度的：

1903	光绪癸卯恩科	河南乡试	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	化学家六十四原质关于农学者凡几，其效用若何，农务化学多合周礼，试参酌中西研求理化，晰言之以资实验策
1903	光绪癸卯恩科	浙江乡试	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	泰西立国其制度法律与周礼春秋为近，其权谋综核攻守制造于管商申韩孙吴输墨为近。其政治家论立法宗旨不外公意公益又与圣人絜矩与民同好恶并无异理，是其治术人才不出中国模范今取资西国仍宜还证中国庶推勘真切而得宰世纲领策
1903		经济特科	殿试第二场	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
1904	光绪甲辰恩科	会试	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	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资料来源：顾廷龙编：《清代硃卷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

科举改制虽然只延续了短短5年，但这5年中年年皆有乡、会试以及为这几届乡、会试择取考生的院试（包括童试，生员岁、科两考等），因此催生了大量的科举策论试题。而从上面所列举的情况来看，《周礼政要》式阐释西政的表述模式，已经在射策场合成为一种适用的标准。而考生射策、考官幕僚评卷都对这样的书籍有极大的需求。难怪忽《周礼政要》在各地书市受到狂热的追捧。

开明书店股东王维泰于1903年与“同人相约作汴梁之游，籍开风气”，他在开封卖书的时候遇到了让他印象十分深刻的事情“场前买书者，都为临文调查之用”，大家争购新书的目的大都是为了应付考试，

22)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5页。

而不是为了窗下用功，真正深入地了解新学。

在《汴梁卖书记》中，王维泰生动地记载了当地考生争购《周礼政要》的滑稽情形。王带了《周礼政要》三十部，不到几天已经全部卖完，问者依旧络绎不绝。他只好骗他们说“刚刚还有一部，正巧卖掉”，于是来人“顿足拊髀，失声嗟叹”。还有人“汗流气喘而至”，脱口问《周礼》一种有否？一旦得到回答说“没有”则“狼仓左右望，向别家驰去。”更有人借买新书为名，翻阅数种以后，就问起《周礼政要》。王维泰回答说“早已卖完”，来人仍不死心，苦苦哀求。后来王维泰实在不胜其烦，就在门上贴了“《周礼政要》已完”的布告，人们才“始望望然去”。过了几天，某书店突然新到《周礼政要》六十部，是一种石印小开本“与原板迥别，售银七钱”，人们“争先恐后，柜外只手林举，高声索书，极似书院之点名抢卷者”。于是这些书“顷刻售尽”。不过，当他们问那些买书的人到底要《周礼政要》来作何用处，买者“皆莫能言其故”。王维泰等一干书商不尽喟叹“风潮所感，正复不可思议哉！”²³⁾

到1903年以前，《周礼政要》已在坊间被翻刻过十数版。²⁴⁾就笔者所知见的民国二十三年以前的版本就有：光绪壬寅瑞安普通学堂刊本；光绪间福建贯吾斋石印本（不知这种石印本是否即王维泰《汴梁卖书记》里面所提及的“某书店忽续到六十部，顷刻而尽。书系石印两小本，与原板迥别，售银七钱”的版本）；光绪二十八年冬武昌刻本；光绪甲辰仲春上海同文社评点铅印本（以上四本皆作二卷）；光绪癸卯五月求新图书馆（日新图书局）评点本；萃新书社铅印本；民国二十三年八月陕西通志馆《关中丛书》据官书局刻本（按似即光绪二十八年武昌刻本。）重校排印本（此本裁作四卷），等。

1903年5、6月间（光绪癸卯五月）上海日新图书局（或者求新图书馆）见到《周礼政要》被书市狂热追捧的情形，便“特聘通儒”按照科举改制的具体命题要求加上评点刊行，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

评点本的策划者在书的序言中很明确地提到，出版此书的市场定位是为了应对科举改试策论后的资讯危机。由于策论之问题“包举中外古今”，相对于以前考八股而言涉及的资料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学人应试之资料，不可不为准备之研究”²⁵⁾

我们发现，1903年左右，天下读书人为了应付科举改试策论的变化，必须将阅读量扩大到经部、史部的所有书籍，以及《三通》、《会典》等掌故书，再加上猛增的4、5千种译自日本与西方的新书报，这显然使他们应接不暇。而孙诒让的《周礼政要》因为能“贯彻中外古今而溯源于《周礼》”，并能“标举精要，分别门类”、“其所推言之源流利病，纵三古而横五洲，书仅两本，能包罗一切之政法学理”，因此被推作“策论应用各书提要钩元之第一部”。在评点人看来，此书“深言之，可当本国本朝之政治史，又可当中学高等学之普通讲义。浅言之，即便于科举提要钩元之策论资料也”

23) “余带有《周礼政要》三十部，数日已售罄，问者络绎不绝。故诳之曰：“顷剩一部，适售去。”则顿足拊髀，失声嗟叹。有汗流气喘而至者，脱口问《周礼》一种有否？答以：无。狼仓左右望，向别家驰去。更有借买新书为名者，翻阅数种后，便问《周礼政要》，以早罄对，犹坚恳不已。缘此书各坊不备，故以居奇相揣度。余等厌其聒耳，遂大书“《周礼政要》已完”榜之门，于是始望望然去。至初七日，某书店忽续到六十部，顷刻而尽。书系石印两小本，与原板迥别，售银七钱，争先恐后，柜外只手林举，高声索书，极似书院之点名抢卷者。问以究竟何用？皆莫能言其故，风潮所感，正复不可思议哉！”，参王维泰著，张仲民校《汴梁卖书记》，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02

24) 《评点周礼政要·日新图书局谨识》，参《评点周礼政要》，求新图书局光绪癸卯五月。此书扉页注意告示署“日新图书局”，《评点本序言》署“求新图书馆评点者自序”，正文又署“日新图书馆评点”难考是否盗印，或者错刻。

25) 参《评点周礼政要·序》，光绪癸卯五月，求新图书馆刊本。

不过在1903年的读书人看来,《周礼政要》仍然有两个缺点。第一,因为它以《周礼》为名,因此“《周礼》所未有之事类,间有缺而未详者”。第二,它的说法“尊古太过”,与“近世进化公例”未免抵触。不过,评点者解释说“恭敬本国,不至抑中扬西之太甚,亦国民教育不可缺一义”,何况中国的经义相当于日本的“武士道”,属于国粹,应当修理、引申却不能“变革”之。²⁶⁾

《周礼政要》比较显著的优点除了能“提要钩元”之外,还在于它从经典出发来叙述“新理新法”的方式。所谓“文章尔雅,训词深厚”,不多用“自由平等之新名词”,不偏重“宪政民权之新学说”。虽然那些新的知识都是“吾国文字界未经人道者”,别人或者没办法形容,而必须采用新词新例,但是“而出以孙君之词之笔,竟能与原有之故事无异”。因此从市场的眼光来看,特别能投合“半新半旧时代人之眼帘脑袋”。所以如果“应考之士,家置一编”的话,可以使人们在满足“策论揣摩之旧嗜好”的同时而兼收“灌输以科学统合之新智识”的效果。大而言之,竟能“因势利导”开启民智。²⁷⁾

求新书局的评点人主要从科举改制以后图书与知识市场的需求来考虑问题,因此觉得《周礼政要》“以周礼为之纲”讨论西政、西法的方式,十分实用。既可以作为中国当代的政治史来读,又可以直接用作教材,也好作为科举策论的应考工具书。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陈述方式本身,特别适合当时“半新半旧”的人来用。因为在1903年左右,虽然已经有不少谈论西政、西法的文章。可是能够做到典雅,不多用“自由平等之新名词”,不鼓吹“宪政民权之新学说”,而又把以前在本国文本中没有范例的西政、西法表述清楚,并诉诸文字的便只有《周礼政要》所采取的系统“修理”、“引申”古经的方式了。显然,从科举改制到全面预备立宪之间这段前途暧昧的“半新半旧”时期,人们既要写大量的文章来应考,却又缺乏足够的表达手段。《周礼政要》所提供的表述方式,就成了一种以文字来讨论西政、西法的流行风潮,成为一种标准。正如王维泰所说“风潮所感,正复不可思议哉”。事实上,这种叙述形式甚至被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民国以后的20、30年代,此是后话,暂不赘述。

不过,既然《评点周礼政要》所针对的读者是科举改制后急于按规定写出“临场”策问的考生,而孙诒让原先拟作时主要是为了替盛宣怀上奏言新政改革方案的。那么,求新书局的评点人还必须对原著拆解古经的方式重新作一番再拆解,方能妥帖地适应新的时代与市场需求。用评点人的话来说,就是“其评语中,有标识,有发明,有辨订,有注解。又有著书时所预言,今朝廷已见诸实事者,亦为补记,以免学人之误于蹈袭”。以下也仅以《冗官》一篇的几条评注为例,来看一下《评点本》对于《周礼政要》的再解读。

评点本针对《冗官》一篇引用《周礼·天官叙官》、《大宰》、《地官·槁人》及郑玄注来解释周秦汉唐

26) “……惟既以《周礼》为名,故《周礼》所未有之事类,间有缺而未详者,而大端要务,则约略已具。又其说尊古太过,律以近世进化公例之同古道于幼稚,未免背驰。而恭敬本国,不至抑中扬西之太甚,亦国民教育不可缺一义。盖吾国之经义与日本之武士道,各为其国魂之所寄。若必于吾国旧俗中求所谓国粹而保全之,则经义之至尊至重,当视同日本之武士道,可为修理,可为引申,而不能与民变革者也……”,参《评点周礼政要·序》,光绪癸卯五月,求新图书馆刊本。

27) “……其文章尔雅,训词深厚,不多用自由平等之新名词,不偏重宪政民权之新学说。其言新理新法,为吾国文字界未经人道者,在他人或难于形容,而出以孙君之词之笔,竟能与原有之故事无异。其于半新半旧时代人之眼帘脑袋,尤为投合无间。应考之士,家置一编,夤缘其策论揣摩之旧嗜好,灌输以科学统合之新智识,庶几能于吾国古哲学司马迁因势利导之政术焉……”参《评点周礼政要·序》,光绪癸卯五月,求新图书馆刊本。

官制的开首一段文字，在额注上注“考论详允可作本国史官职志读之”。我们发现，评点者从当时读者需要的角度出发，把孙诒让征引古经讨论西政的文字，作了知识上的重新归类，认为这些文字可以归入读者关于“本国史官职志”的知识储备。

评点本针对孙诒让在“谨案”之后从周代“六官三百六十职各有职掌”开始，叙述历代官制的变革得失的304字。额注“汉唐宋之中国亦非有完善之政体，其时之情通事举，必有以大过于今日，作者此等言论犹未免儒生尊古之见。全书如此类者甚多，欲求情通事举，特有改良之官制，尤贵有行此改良官制之权限与其人材。教育不兴、宪法不立而徒改良官制无益也。”批评了孙诒让推崇古代制度，从复古的立场出发，来追求政治变革的进路。虽然评点者在序言中说到孙著的优点之一是“不鼓吹宪政民权之新学说”，但是他在做评点的时候仍然表现出支持立宪的立场与主张。这恐怕是由于评点本出版的时候整个文化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谈立宪法及兴教育已经成了市场的需求之一，进化论也日益在现实论域中获得了强大的合法性，复古已经是许多“开明”知识分子不能不批判的落伍取向了。虽然从孙著出版的1901年到评点本刊印的1903年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晚清文化知识市场及政治舆论论坛的风气变化之大，于此亦可见一斑。

评点本针对孙稿中“再加以除满汉之畛域，通文武为一途，则内外员缺必可简汰三分之一”一句，称“二语为改良官制必要之宗旨”。此外，此篇另有三条额注“冗官之弊状”、“裁官之条理”、“裁官古事”都是普通的为原稿文字作小结性提纲的批注。可以看到评点本对《周礼政要》原文所作的再提炼，以适应读者的应用。

孙诒让受托按照“以《周官》为之纲，以历代政治之因革损益诸大端为之目，包举西政”的方式而作的新政条议并没有得到朝廷官员的认可并上奏朝廷，却在科举改制文化、知识市场发生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受到了狂热的追捧。市场对它的需求是作为新式教科书，作为写作科举应试策问文章的范本，作为“提要钩元”应付“半新半旧”时代人们知识结构脱节的急救药。《评点周礼政要》便是直接因应这样的市场需求而产生的。我们发现传统经典《周礼》不仅因此而被根据市场的新需求作了再拆解，与两年之前诏议新政时期“朝廷大吏”希望借助它找到讨论新政之理论模式已经不尽相同。更有甚者，《周礼政要》所提供的表述方式，已经因为科举市场的传播和推销而逐渐变成一种以文字来讨论西政、西法的流行风潮，成了某种“标准模式”。显然民间市场对传统经典的应用与朝廷大吏们还是有着巨大差异的。

余 论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知识世界的变化开始与现实政治形势之“变局”异常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连绵不断的变化中间，朝野改革论者围绕着对传统资源的诠释、拆解与应用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纷争。戊戌维新论者、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朝廷大吏、盛宣怀等希望积极深入参预新政改革的洋务官员、孙诒让等古文经学大师、求新书局等书商，究竟谁才能得到诠释《周礼》这一经典的主动权？

戊戌前后，学术上宗今文经的康梁维新论者并没有排斥使用古文经《周礼》来作为论证资源，不过其应用方式是“寻章摘句”式的简单比附，将“询国危疑”的记载与西方民主代议制度等同。而张之洞在戊戌维新尚未完全失败的时候就抛出《劝学篇》，欲自别于激进的维新党人。他同样应用《周礼》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他的做法是试图从整体上探讨《周礼》背后的“治官”的思想，以此作为论证变革合法性的资源。不过张作为朝廷大员，他试图以解经者的姿态来使用《周礼》这一资源，却又没有相应的学

术声望来调和经学上固有的纷争，因此难免遭人诟病。庚子辛丑之际，朝廷诏议变法，并以“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的原则为自己实行与戊戌政改类似的变革进行舆论的辩解。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官员盛宣怀揣摩天心，选定古文经《周礼》以取代维新派的《春秋公羊传》，希望借助它来为改革进行舆论建设。他请来周礼学大家孙诒让，让他根据“《周官》为之纲，以历代政治之因革损益诸大端为之目，包举西政，寻其源之出于中法、不谬戾于经义、可实见施行者，条举而件系之”的原则来条议新政。孙诒让虽然系统地创造了以一种纲举目张的方式来拆解《周礼》的经文和经义，但是由于他和后来的修改者文廷式都过于注重理论的铺陈，而在改革的具体操作层面思虑不够缜密，难脱书生议政之风，因此最终并没有得到上奏。但是《周礼政要》所创造的讨论西政、西法的方式却因为科举改制而受到了热烈的追捧。有敏锐市场嗅觉的书商们发现，《周礼政要》不过于使用“自由平等之新名词”，不鼓吹“宪政民主之新学说”而是从传统资源出发，用典雅的文字与表达方式叙述了中文世界从来没有被表达过的一系列新内容。这种表达形式，特别适合这种半新半旧的时代，也特别能满足科举改制考生写作大量策论的需求。因此他们根据这种特殊的市场需求，重新对此书加以评点，也从另一个角度重新拆解了《周礼》这一古文经典籍

我们发现在这种错综复杂，此消彼长的纷争中间，却已有一点渐渐明确起来：那就是《周礼》已经在这种纷争中，凭借着各种不同动因的传播，而从戊戌时期的传统论证资源渐渐变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表达方式，一直延续到民国以后。²⁸⁾而《周礼》作为古文经的经典也渐渐从经学的典籍变成论证资源而后又被成熟起来的现代学科体系所容纳，渐渐成了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哲学研究的对象。这一些问题已经不是本

28) 根据《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及《中国近代报刊篇目索引》所载，从清末到30年代末，散见于报刊上讨论《周礼》的论文比较重要的大概有如下这些：《西学发源周礼考》（学术汇（隶内政门）），《广智报》，1898年7月3日，第廿一册；《周礼管商与西国政治家律法家多合说》，《浙江新政交傲报》，1902。（壬寅春季智集），10期；陆绍明：《论古政备于周官》，《国粹学报》，第一卷第十期，1905年10月；孙雄：《论振兴工艺当师周礼之精意》，《直隶教育杂志》，1906年1月，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第一年第21期；但焘：《周礼政论》，《华国月刊》，一卷二、五、七、九、十二期，1924年6月，但作于1910年左右留日期间、《周礼司徒各官说》，《嗽社学谭》，1911年7月10日，第5期；《周礼宣布法令以下及于民为主》《嗽社学谭》，1911年7月10日，第5期；孙乃湛：《周礼合近世国法说》，《国学杂志》，1915,5月14日，第2期,3-6页；曹佐熙：《读考工记》，《船山学报》，四期，1915年11月；刘师培：《古周礼公卿说》，《中国学报·经类》，第四期，1916年4月；蔡光宇：《读周礼有感今县行调查户口制》，《浙江警察杂志》，1920年1月；李次坡：《周礼序官赞》，《四书月刊》，十五至十九期，1922年-1923年；刘善泽：《说周官媒氏奔者不禁》，《学衡》，十二期，1922年12月；刘师培：《西汉周官师说考》，《国学丛考》，一卷一期及二卷三期，1923-1924；陈汉章：《周礼行于春秋时证》，《华国月刊》，二卷一期，1924年11月；刘绍宽：《周礼郑注方丘祭昆仑北郊祭神州说》，《华国月刊》，三卷二期，1926年5月；孙乃湛：《周礼合近世国法说》，《国学》，上海大东书局，一卷二期，1926年11月；魏运五：《周礼司法制度考》，《东北大学周刊》，廿六与廿七期，1927年，6月；魏运五：《周礼上之乡遂自治制度考》，《东北大学周刊》五十七至六十期，1928年，11月；治民：《春官七史征文》，《东北大学周刊》，七十七至七十九期，1929年7-10月；黄云眉：《周礼五史辨》，《金陵学报》，一卷一期，1931年5月；吕思勉：《马郑序周官之谬》，《光华大学半月刊》，二卷七期，1934年4月；陈衍：《考工记辨证》，《国学论衡》，三与四期，1934年6-11月；龚汉：《孟子旁通周礼考》，《国专月刊》，一卷五期，1935年7月；吴承仕：《释车上》，《国学论衡》，七期，1936年4月；程尚川：《读书札记仪礼·周礼》，《华西学报》，四期，1936年6月；孙文昱：《周官小记》，《员幅》，一卷二期，1937年1月；顾颉刚：《读周官职方》，《禹贡》，七卷六与七期，1937年6月；陈衍：《周礼辨证》，《国学专刊》，一卷一期；张其昀：《柏拉图理想国与周官》，《史地学报》，一卷一期；薛念梅：《周礼上之田制问题》，《社会杂志》，一卷四期；敖士英：《周官六官沿革考》，《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31年4月（第一编下册），参见《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版，第21-127页。《中国近代报刊篇目索引》，上海：上海图书馆编。

文所能涉及的了。只能留待方家细究详察之。

